

麗江古城旅遊者的康復性體驗研究

黃清燕¹ 白 凱²

(1.西安外國語大學,西安;2.陝西師範大學,西安)

摘 要:康復性景觀理論認為,環境和體驗是理解景觀具有“康復性”的關鍵,這為解析旅遊與健康的互動關係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依循該論斷,本文以麗江古城的旅遊者群體為研究對象,試圖對環境—康復性—體驗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行實證探究。通過對麗江古城旅遊者群體進行訪談和文本分析,主要獲得如下研究結論:(1)在麗江古城,自然、社會、象徵環境構成的康復性環境,與旅遊者日常生活環境形成反差性、互補性,為旅遊者康復性體驗提供了客觀基礎和外部條件;(2)物質體驗、情感體驗、社會體驗是旅遊者與麗江古城康復性環境的聯結方式,也是麗江古城康復性體驗的具體體現、形成過程與結果呈現。文章試圖突破旅遊與健康互動過程中“因果關係”或“解釋機制”的個體中心主義或人類中心主義,轉向從“人-地”兩端縱深化、系統化考慮旅遊與健康促進、社會福祉增進的關聯,為旅遊目的地有效回應日益增長的健康需要提供現實指導。

關鍵詞:康復性景觀;旅遊體驗;康復性體驗;康復機制;旅遊目的地;麗江古城

中圖分類號:F59

Research on the Therapeutic Experience of Tourists in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Huang Qingyan¹ Bai Kai²

(1.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2.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編號:42071186);陝西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編號:2022KRM044)。

作者簡介:黃清燕,西安外國語大學旅遊學院·人文地理研究所特聘副教授;白凱,陝西師範大學地理科學與旅遊學院教授。

Abstract: Therapeutic landscape theory suggests that environment and experience ar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therapeutic” nature of a landscape, thereby providing an important research idea for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health. Following thi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 therapeutic landscape, and tourist experience with a group of travellers in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interviews and textual analysis, the study has reached such conclusions: (1) the natural, social and symbolic environment in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has formed a contrasting environment with complementary benefits to the daily life of travellers by providing objective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for their therapeutic experience; (2) physical, emotional and social experiences not only are the ways in which travellers are linked to the therapeutic environment, but also are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formation process and result presentation of the therapeutic experience of the Old Town. The study attempts to break through the individual centredness or anthropocentrism of “causality” or “explanatory mechanism”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health, and move towards a more systematic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health promotion and increased social well-being from both ends of the “people- place” continuum, thus offering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ourism destinations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growing health needs.

Key words: therapeutic landscape; tourists experience; therapeutic experience; therapeutic mechanism; tourism destinations; Old Town of Lijiang

引 言

健康是人類關注的永恆話題，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誌。現代社會在技術理性、功利主義支配下，社會大眾面臨著一系列“現代文明病”和健康困境。加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席捲蔓延，健康已然成為人們追求美好生活中最普遍、基礎的需要。通過旅遊尋求健康日益普遍，旅遊所蘊含的逃逸、放鬆與休閒、自由與愉快等特質，使其成為個體反抗現代社會工具理性、功利主義的積極嘗試，獲得或者調整健康的重要途徑和關鍵行動，甚至催生了一系列以健康體驗為主題的旅遊目的地。旅遊與健康的

關係在當下顯得尤為重要，作為核心承載的旅遊目的地或旅遊過程，到底如何讓旅遊者產生健康體驗，其學理構成值得深思，亟待探索。

近年來，健康地理學領域提出了康復性景觀概念，表明康復性體驗是地方自然、社會、象徵環境與主觀健康感知的“交織共同體(*entwined becomings*)”。旅遊研究對其引入，進一步詮釋旅遊目的地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象徵環境是旅遊者獲得康復性體驗的基本框架。旅遊體驗作為旅遊客體與旅遊主體的互動過程，充滿複雜性、不確定性、動態性，而旅遊目的地具備何種特質才能有效促使旅遊者產生康復性體驗尚待實證考察。

麗江古城被探險家約瑟夫·洛克稱為“夢中天堂”，它以“治癒”“療傷”“慢活”聞名於世，是現代性彌漫下的“香格里拉”。當地居民、外來經營者，“麗江漂”“麗江駐客”與旅遊者都沉浸並宣揚麗江古城的“治癒”力量。麗江古城的體驗和回饋契合了康復性體驗的概念本源，即康復性體驗並非是醫學層面特定疾病的醫療與治癒，或是從受損狀態到未損害之前的完全恢復，而是對人類健康和發展產生的主觀感知和實質性好處，包括調節壓力、緩解焦慮、增進歸屬感、增強幸福感、促進社會互動等。基於此，本文以麗江古城為案例地，重點討論：麗江古城的環境特徵如何引導康復性體驗的產生？旅遊者如何從麗江古城的環境結構中獲得康復性體驗。文章致力於從“環境—旅遊者—體驗”關係的能動性回應康復性體驗的形成過程，旨在從旅遊發展過程中拓展旅遊目的地，促進健康的新型人地關係。

1 相關研究進展

旅遊體驗自 20 世紀 70 年代提出以來，已成為旅遊學界重點關注的核心命題，旅遊體驗的概念、構成、本質、理論建構、影響因素等多個方面均被加以探索和研究的。由於“體驗”概念的複雜性，導致其在不同旅遊研究典範中的釋義也不盡相同，既是旅遊者心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描述旅遊活動意義的工具，還是旅遊的基本認知和符號代表。隨著對旅遊體驗的本真性、舞台化、商品化、系統性、建構性等議題廣泛而深入地探究，學者們發現旅遊體驗不僅僅是個體賦予其意義的主觀心理過程，也是環境與

人、人與人、人與地複雜關係的活動過程。

旅遊消費的轉型與發展，旅遊主體體驗需求日益個性化、差異化和多樣化，新的旅遊體驗類別逐漸分化，健康體驗日益成為旅遊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學者提出從“超越表徵”視角出發理解健康體驗不僅是與個體行動相關的體驗，還涉及身體與物質對象、物質環境、物質事件等，既要關注健康體驗的意識層面或者內在特質，也需關注健康體驗所依存的時間與空間，以及人與非人同時在空間內的居住、行動、表達。旅遊與健康的關係機理，需要置於動態的、異質的新型人地關係中探索。

健康和福祉已經成為新時期旅遊發展的價值追求和現實導向，相較於實踐層面健康旅遊的快速發展，相關研究缺乏視角創新和理論貢獻，尤其是旅遊中健康體驗和健康效應的形成機制尚不明晰。健康地理學中的“康復性景觀”為旅遊促進健康的內在機制提供了良好理論借鑒。康復性景觀(therapeutic landscapes)概念最早由健康地理學家 Gesler 所提出，他認為“康復性景觀是自然環境、社會環境、象徵環境與人類感知相結合，對個體健康、生活狀態具有促進作用的地方”。Gesler 表明，康復性景觀概念的提出啟發於 20 世紀以來文化地理學對文化景觀的闡釋，康復性景觀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景觀，其核心要義在於詮釋“傳統或非傳統景觀在康復過程中環境、個人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的複雜方式和結果”。

康復性景觀理論發展演變過程中，康復性環境逐漸從現代醫療保障系統，拓展至更為常見的場所、空間和地方。康復性景觀相關研究主要包括：(1) 不同尺度空間、環境

或地方康復性功效與價值的實證檢驗。久負康復盛名的自然聖地或者宗教場所,居住社區、花園、城市綠地、海岸等日常生活空間,提供特殊健康服務或健康活動的療養中心、關懷場所,家、藍綠空間、黃色沙漠空間等的康復性效益均得到了實證檢驗。Gesler認為不同環境或地方的康復性效益獲得實證,很好地詮釋了康復性景觀並非立意於將地方或環境進行康復性與非康復性二元分隔,而是致力於從人地互動過程解剖地方與健康並存的可能。(2)康復性景觀作用機制的爭議與批判。不同的文化情境、人群特質、自然與非自然元素、地方感、非人類動物均會對康復性機制產生影響。(3)康復性景觀研究方法的探討,既有研究肯定了定性研究方法對康復性景觀本質深描的重要性,涉及訪談、隨行訪談、心理實驗、地理資訊技術、話語分析、自我敘事、照片引導、聲音引導等研究方法。

綜上所述,環境與主觀感知是康復性體驗及其效益形成的核心要素,從根本上反應地是人、環境與健康之間的複雜互動。Duff引入行動者網路理論將康復性景觀詮釋為提供物質、情感、社會支援的資源網路,個體體驗反之會能動性地將地方建構呈現為“賦能性地方(enabling places)”。同樣,Kearns和Collins也在其研究中指明,康復性景觀具有偶然性,關乎特定時空的環境特徵,以及個體的意識形態、權力、抵抗。康復性景觀理論引入旅遊情境中,如何整合旅遊目的地的環境特徵、旅遊者自身的主體特徵與主觀體驗,將為進一步詮釋康復性效益形成機制提供新的研究情境。

2 案例地概況與調查

2.1 案例地概況

麗江古城隸屬麗江市,地處滇西北、界連西藏,地勢險峻、山高谷深、灘多流急、交通不便、環境閉塞,漫長歷史時期都鮮為人知。群山環繞、田野開闊、水系發達的麗江壩子成為了納西族人安身立命、尋求發展的理想居住之地,麗江古城在此逐漸形成。“城依水存,逐水而居”達成天、地、人相生相融境地,契合了中國本土文化養生、長壽的空間本底,被俄國作家顧彼得認為是療癒自我、體悟幸福真諦的“被遺忘的王國”。1997年,麗江古城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聲名鵲起。大批逃離現代性的都市白領、小資群體隨之駐留於此,將麗江古城渲染成為了神清氣爽“病人們”的聚集地,“去麗江療傷”已經成為都市迷宮裡苦苦掙扎者的普遍選擇。如今,麗江古城仍被認為是對抗、熨平現代性之瘍的“香格里拉”,疏解壓力、重拾自我的“夢中天堂”,逃避快節奏和高壓力的理想化“烏托邦”。

有學者對麗江古城的旅遊目的地意象探索分析發現,麗江古城是“反現代化”“浪漫”“美好”“健康生活”的“他地”,是段義孚先生浪漫主義地理視域下人性與大地互動中崇高卓越的地理景觀。親近自然、慢生活、休閒養生自始至終滲透到麗江古城發展變遷中,甚至成為古城現今活生生的文化心態。2018—2020年之間,麗江古城連續上榜“中國康養城市排行榜50強”,逐漸成為中國國內旅遊者追求身心放鬆、健康幸福的熱門旅遊目的地。麗江古城的生長機理

和發展演變軌跡,始終和人與自然、人與他人相容並存實現人類文明對幸福和歡樂的追求息息相關,這也和康復性景觀概念本源對地方與健康互動關係的闡釋具有高度一致性。

值得注意的是,麗江古城並未有強有力的醫療資源支撐,健康、養生、療傷如何得以實現值得深思。源於此,筆者自 2017 年進入麗江古城開始田野調查,聚焦麗江古城的時間結構、日常生活與健康等問題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充分確立了麗江古城與康復性景觀之間的密切關係,發現到訪者的動機均在不同程度上與焦慮消解、壓力緩解相關聯。同時發現麗江古城已成為旅遊者心儀的療癒自我目的地,相較於廣西巴馬長壽文化主導的康復機制,以及醫療保障體系的醫療干預過程,麗江古城突顯為舒適氣候、優良空氣品質、充足陽光、慢生活氛圍等綜合要素的療癒作用,為旅遊的康復機制探究提供了更多元的案例選擇。

2.2 案例地調查

為了充分瞭解案例地的基本情況,對案例地形成盡可能可靠、立體的認識,筆者於 2017 年 7 月 15 日-30 日、2018 年 5 月 22 日-30 日、2019 年 5 月 13 日-22 日、2020 年 10 月 10 日-28 日連續 4 年赴案例地調查。旨在通過對麗江古城的旅遊者進行深度訪談,獲得對麗江古城康復性體驗形成的深入闡釋。通過初步的交流和瞭解,具體選擇的訪談對象呈現如下特徵:明確提到來麗江古城是以放鬆、自我調節為主要目的;在旅遊目的地停留時間較長,超過 5 天 4 晚及以上。共訪談旅遊者 57 人(編碼為 C01 -

C57,其中 C01 為季節性度假旅遊者,訪談 3 次;C02 為季節性度假旅遊者,訪談 2 次)。訪談過程中,通常以熱身問題開始:“您為什麼來麗江古城?”“您今天什麼時候起床的?”“麗江古城為什麼讓您感到放鬆”等。

經歷多次刪改、增補、滾動式調整之後,確立最終的訪談提綱:(1)麗江古城整體認識。包括麗江古城的概況(自然環境、地理環境)、形象與特色。(2)麗江古城的感知與體驗。來麗江古城的動機、決策、重遊次數、想像和實際感受等。(3)麗江古城的日常生活與自身日常生活差異對比。(4)麗江古城的療傷、治癒。包括療傷的經歷、可能的影響因素。(5)麗江古城的社會交往與氛圍。包括經營者與旅遊者、旅遊者與旅遊者之間的交往。經訪談對象許可,所有訪談過程均已錄音,並在訪談結束 24 小時內撰寫為文字稿,隨即進行資料初步分析,累積獲得訪談文本 111 余萬字。訪談稿整理完畢後,立即仔細閱讀一遍,如有疑問,則與受訪者進行電話或當面確認,對訪談內容修正完善,有效建立訪談資料的可信度與可分析度。訪談資料整理完成後按照文本分析的方法梳理出麗江古城環境、旅遊體驗、日常生活對比等相關主題,進而闡述康復性體驗形成的內在邏輯。

3 麗江古城的康復性環境結構

康復性景觀鑄刻在地方內外相互聯動的社會、文化與自然/環境網路之中,環境框架是康復性景觀及其效益建立和形成的基礎和前提。Gesler 強調康復性景觀由地方自然、社會、象徵環境要素綜合作用而成,忽

視任何一種環境要素的影響，都會使康復性景觀理論欠缺解釋力。由此，文章首先從麗江古城自然、社會、象徵環境三個方面去整體思考其環境的結構特質，進而為理解環境特質對康復性體驗產生的積極作用。

3.1 自然環境

納西族先民建立麗江古城的過程，實際就是認識自然、順應自然、利用自然，將自然環境賦予的優勢進行極大化彰顯的過程，促使麗江古城成為了依山靠水、臨水布街、沿河延伸，光照充足、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典範聚居環境。“小橋流水人家”的詩意空間，達成了海德格爾所描述的天、地、人、神“四元”相處共舞的境界。麗江古城的自然環境讓作家顧彼得領悟到真正意義上的幸福，他將麗江古城認定為是《消失的地平線》所描述的“香格里拉”和東方的“人間天堂”，他在書中提到：“我凝視這天堂的景色，氣溫溫和，空氣芳香，玫瑰花遍地都是，小溪急流淙淙，百靈鳥和其他鳥類的啼叫聲如同神靈的音樂。”“麗江就是這個樣子，街道鋪砌整齊，沒有灰塵，沒有臭味”“麗江是一種沒有摻雜過多奢華享樂的天堂景色，而是一種通過智慧和愛而得到的轉化物”“我在麗江的幸福生活，我覺得與世無爭了，更為重要的是，我的心坦然了”（分別節选自《被遺忘的王國》30 - 31 頁；52 - 53 頁；312 頁；313 頁）。

麗江古城自在生成的發展格局、向心平和的空間品格、因水成勢的肌理特徵以及純樸自然的營造取向成為其至今保持獨特魅力的關鍵所在。麗江古城歷經數次修葺完善，“順應自然”的邏輯沒有被人為扼殺，原

真的生態基底，建築、道路依舊隨地形、環境、水系變化多端，整個古城精美雅致、色調和諧、外觀樸素，兼具經濟、生態和美學價值。麗江古城自然環境的優越性，賦予了其得天獨厚的自然舒適物，涵蓋了氣溫、濕度、日照天數、水域、總體自然吸引力等要素，自然舒適物對個體情緒高漲、心情舒暢、生活愉悅等正向影響早已達成共識。麗江古城自然環境呈現出以鮮花、綠植、陽光、氣候、氣溫為核心要素結構，而這類成分組合被認為是康復性景觀的調色板和質料，也是康復性景觀原真性甚至理想化的客觀環境存在，對於降低疲勞、調劑心情、促進健康至關重要。

3.2 社會環境

麗江古城隸屬茶馬重鎮，各方流動人口輾轉停歇於此，多元、開放、包容由此根植在古城的社會網路結構中。1996年，麗江古城在遭受了地震災害的重創，地方政府、納西居民、外來經營者等群體進行了多維度地改造與重構。麗江地方政府遵照“修舊如舊，恢復原貌”的邏輯主線，綜合真實性、生活性和完整性的要求，對麗江古城進行保護、改造、修建基礎設施等，麗江古城的古與真、納西民族風俗與文化得以根植和延續。麗江古城重構過程中並未草率地退守至原始而落後的烏托邦，反倒適應社會發展成為介於城市和自然兩個極端的中間景觀。通過限制車輛進內，高速運轉的世界被隔離在外，古城漫步，充斥著身體與自我流動的社會想像、社會聚集與社會互動，恬淡、自由、閒適的詩意棲居氛圍由此延展。

地方政府對古城的修葺完善、管理與保

護推動麗江古城走向世界。申遺成功之後，麗江古城產業結構轉型為旅遊主導，社會網路結構隨之變遷。自然風光、民俗風情、傳統古樂、東巴文化、悠閒生活、小橋流水人家與高速推進的社會發展形成鮮明對比，吸引了大量城市社會或者都市生活的小資群體、文藝青年、背包客，甚至是“駐客”或“麗江漂”，到此尋求豐富多樣的感官體驗和原真性的生存體驗，滿足其逃避自然、逃避文化、逃避混沌的本性需求，麗江古城因此成為短暫性逃離現代性和都市社會壓迫的“他地”。納西原住民逐漸從古城退卻，納西民居變成了為外來經營者追逐、製造生活情趣的場所，外來群體所攜帶的情感經歷、理想情懷、生活體悟隨之整合進古城空間內，酒吧、書吧、火塘吧、咖啡吧、手工藝作坊便是最直接的佐證，“泡吧、喝咖啡、曬太陽、發呆”成為了外來群體整合納西族人傳統休閒而成的小資雅文化。外來群體改變了麗江古城的社會結構，又以自身的行為方式、活動表現和在地實踐將麗江古城置於現代化的對立面，並在此沉湎懷舊和對抗無處不在的都市化與現代性，尋找理想的生活情調和生活品味，安置自身對生活和生命的獨特感悟和理解。日益增多的外來追逐者與古城淳樸的“土著”文化接觸滋生了浪漫執拗的“遠方之愛”，麗江古城成了城市浪子的心靈庇護所、精神歸宿，多元性、複雜性和流動性的社會結構將麗江古城塑造成為具有情感關懷、包容、自由化的生存情境。

3.3 象徵環境

麗江古城在發展變遷過程中，得益於自然環境的舒適性和社會環境的包容化，“浪

漫”“慢活”“休閒”不斷被強化甚至成為麗江古城的符號標籤。2003年，《一米陽光》播出，使麗江古城成為社會大眾想像、追求、邂逅浪漫愛情的聖地，當地政府順勢推出“麗江柔軟的時光”和“麗江一米陽光”等品牌行銷。外來經營者從事旅遊商業活動過程對古城的浪漫特性進行了擴大呈現，從客棧和酒吧便可窺見一斑。就客棧而言，“慢時光”“陽光”“發呆”“邂逅”“看書”“品茗”等直觀文本，盆景、鮮花、秀珍魚塘、茶臺、搖椅、鈴鐺、藏族銀器等物質裝飾，集中渲染了“麗江的柔軟時光”與“麗江的慢時光”，成功地向外部世界渲染了麗江古城的浪漫形象。酒吧興盛發展，促使各地嚮往自由、奔放、流浪的大眾集聚於此，麗江古城被隱喻為精神樂土。“酒吧”“邂逅”“豔遇”逐漸成為了麗江古城的標籤和符號，昔日的“歷史文化名城”逐漸走向了“浪漫邂逅之都”“豔遇之都”，麗江古城的發展也進入“浪漫迷思”階段。外來經營者對浪漫的極度渲染，推動了麗江古城“去地方化”進程，旅遊者關注的重心也從麗江古城的歷史文化景觀轉移到地方浪漫氛圍，彌補了個體在社會“向前發展”洪流中懷舊、真實與自由等浪漫情感缺失與渴望。

與此同時，外來經營者基於納西族人“懂生活、愛休閒”的生活品性，通過喝茶、曬太陽等空間活動為媒介，將麗江古城悠閒、淡然的慢生活在新時空環境裡延續並且具象化。麗江古城的休閒已經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特質和空間現象，被細分為基於民族特質之地方實踐的傳統性休閒、基於文化認同之傳統發明的群體性休閒、基於場所依賴之空間展演的日常性休閒。而休閒本身

就被視為具有放鬆、靜心甚至“心閑體靜”“心寬體健”的功效。從休閒延伸而來的慢生活,是麗江古城的另一種地方性、符號象徵和精神內核,慢活以截然相反的減速邏輯促使個體達成自我與環境、個體與自我內外在的平衡,重新審視自我價值、生命意義。慢活引導旅遊者從現代性所造成的異化、生態環境的惡化和生活節奏的程式化等狀況中獲得暫時“解脫”,也促使古城能夠從表

層的放鬆感官體驗,關聯到更深系統的健康調整。

麗江古城的環境結構是地方主體生存發展的具體情境和關係網絡,反映了人們的生活實踐過程對健康意義的追求和演繹,呈現環境與健康的系統聯結和正向關聯,也由此將麗江古城康復性環境的特質顯現化和具體化(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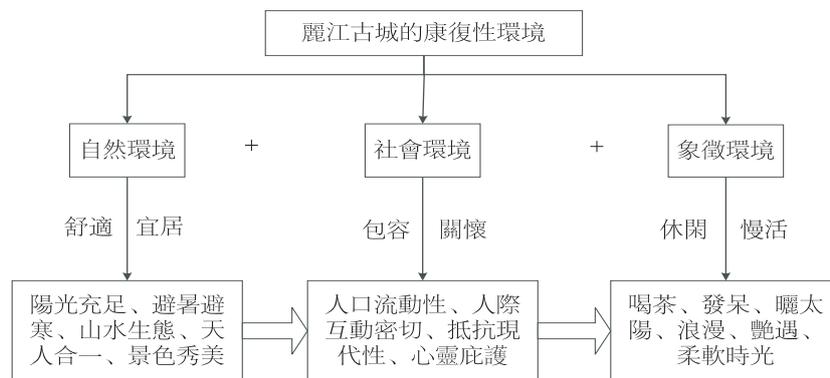


圖 1 麗江古城的康復性環境特徵

4 旅遊者康復性體驗的類別

麗江古城從環境層面確立了某些旅遊者慣常生活環境不具備或尚未被發掘的康復性,為個體與健康的正向互動提供了可能性條件,但並不能意味著旅遊者必然能夠在此獲得康復性體驗。Tengland 指出健康可以被理解為一個“項目 (project)”,是一種需要特定能力支援實現的狀態或品質,意味著康復性體驗不僅需要旅遊目的地的外部支援,同樣需要旅遊者自身的內部生產,包含了自然與人文、環境與感知、客觀事實與主觀建構多重互動邏輯。Duff 引入行動者網路理論,強調康復性效益的產生是在一系列康復性體驗、網路、聯繫中建立和創造的。深入理解康復性體驗和效益的產生,需要重

點關注個體在物質、情感、社會體驗層面獲得的相應支援,進而為確定康復性體驗以及描述其生產和建構的內在機理提供依據。

4.1 物質體驗

在討論宏觀層面公共健康干預措施時,往往強調物質資源對於維護健康、增加福利、開展健康促進活動的重要性,地方或環境物質層面的感官接觸成為理解康復性體驗的關鍵所在。流動性連通了旅遊世界和生活世界,為生存環境的感官體驗提供了直接的對比參照。C50 山西太原人,剛剛從工作單位退休,談起此次古城之行,“我工作了三十多年,一直忙忙碌碌,想著退休以後就輕鬆了,但實際上退休以後有種莫名的空虛和失落,適應不了,情緒狀態不太好。在麗江古城開客棧的兒子讓我來這邊玩玩,散

散心。我第一次來這邊，藍天白雲，空氣清新，每天都能見到太陽，不用生活在霧霾之中，狀態一下就好很多。我從小就喜歡養花草草，但家裡地方太小，一直滿足不了這個願望。現在這個院子養了各式各樣的花草，看著各種不同的花兒競相開放，心情特別舒暢。”由藍天、白雲、陽光、空氣、花草構築的優越生態環境為 C50 帶來最為直接的感官衝擊和物質體驗，從而產生了狀態好很多、心情舒暢等積極感知，達成了旅遊者與日常生活或者慣常環境的間離。

由陽光、空氣、植物等物質基礎牽涉的健康體驗也出現在其他旅遊者的敘述中。“我每年三月過來這，這個時間整個古城到處都是鮮花，有很多多肉植物，春意盎然，陽光照下來，空氣中充滿花香。坐在客棧玻璃球裡面，曬著太陽，吹著風，拿一本書，真的會很治癒。(C16)”“張家口一到這個時候各種飛絮飄落，我就皮膚一直過敏，加上張家口比較乾，所以臉上一直起疹子，特別的

癢。到這兒以後，感覺好了一些，這邊空氣好、濕度剛好，臉上不癢得難受，心情自然也好多了。(C10)”“這幾年一邊要忙升職、一邊忙兩個小孩上學，整個人時刻緊繃著，晚上睡覺也很容易驚醒，到了古城這幾天一直睡到自然醒。沒有車來車往，整個環境很是安靜。(C56)”鮮花、多肉植物、陽光、溫度、花香、微風、濕度等物質集合成為“地方調色板”，構成為麗江古城的舒適物，旅遊者藉由光、聲、色調、花香、聽覺、皮膚等一系列感官元素，調動了自身“舒服”“治癒”“安靜”“睡眠”“皮膚狀態”的健康感知與體驗。物質層面引發的健康體驗，已經成為旅遊者對地方認同的具體表達(見圖 2)，回應了麗江古城環境塑造的各種物質資源對於健康促進或健康提升的支撐作用，凸顯優越的自然環境生態品質是康復性體驗產生的根本，同時表明身體、感官是地方環境與康復性體驗的關鍵媒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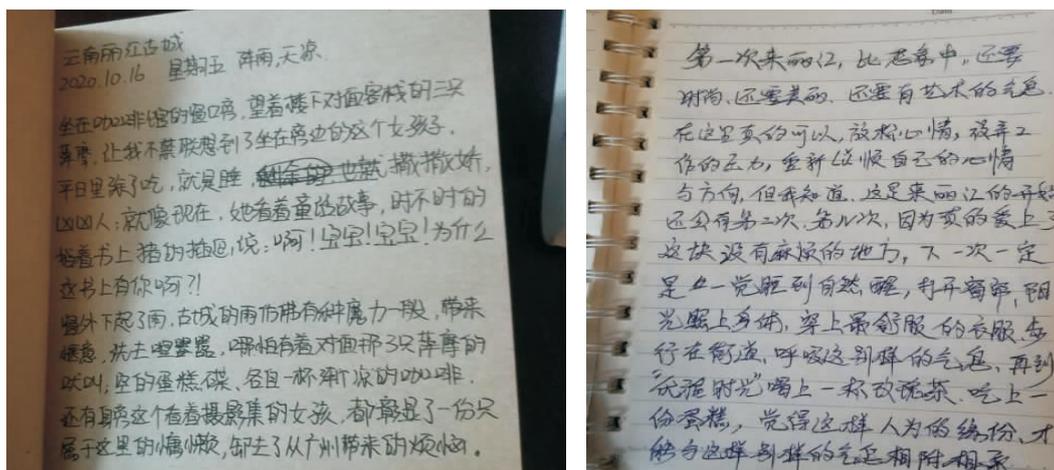


圖 2 咖啡館意見簿內容節選與例舉

注：筆者拍攝(拍攝地點：麗江古城優雅時光咖啡館，拍攝獲得咖啡館老闆許可)

4.2 情感體驗

物質體驗彰顯了個體與自然、陽光、藍

綠空間的親密關係，隱含了客源地和旅遊目的地環境結構的反差性，也意味著康復性體驗的產生離不開流動的重要情境。旅遊者

是流動的個體，攜帶著日常生活種種經歷而產生的各種情緒，尤其是日常生活單調、瑣碎、壓力等負面因素滋生，個體與居住地之間的情感聯繫和意義紐帶被撕裂，導致旅遊者尤為渴望獲得情感補償。筆者發現重游麗江古城的旅遊者，其活動僅局限於古城範圍內，遇到訪談對象 C12 時已經是她第五次重遊至此，她解釋到“這是我第五次來，第一次是 2013 年來的，今年已經是第二次來了。我單純地覺得來這兒，心情會特別好，並不是為了看景點，就想在這裡住一住、待一待，不用想生活、工作、家庭各種煩心事。”

除了從日常生活的繁雜瑣碎中逃離從而獲得“心情好”等正向情感體驗以外，訪談對象還對比曾經的旅遊經歷，強調了麗江古城所產生的獨特情感體驗，C45 談到：“我也去過很多古城，麗江古城給我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在這真的可以慢下來的。有的古城過於僻靜，的確能讓人慢下來，但也讓人感到孤獨，沒有人搭理你，各自忙各自的，這種治癒不了你，只會讓你更受傷。在這，可以喧鬧、可以安靜，可以孤獨、也可以有很多溫暖，這邊你可以和別人一起喝茶、喝酒，晚上一起玩到半夜。就這種感覺就是不一樣，在別的地方找不到，所以這裡的治癒對於我或者很多人而言是獨一無二”。C45 與麗江古城恰到好處的“喧鬧與安靜”“孤獨與溫暖”環境相聯結，實現了真的“慢下來”，並進一步將這種聯結引申為“療傷”“治癒”的情感反應。來自西安的 C09 同樣強調了“慢”帶給自己的療愈效益，“我是做音樂製作，之前自己開了一個小型工作室，長期高壓忙碌，精神和身體出了很多狀況，來這裡就是

想要休息和療養。在城裡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左右，精神紊亂，身體也承受不了。這裡的節奏很慢，讓我精神上不再有壓迫感，也重新感受到對生活的那份熱愛。說到底，這就是我生活出現問題之後，幫我療傷、幫我平復的一個地方，慢下來了，身體狀況好多了、心也安定下來”。麗江古城的“慢”充分滿足旅遊者的“逃離”欲求，擺脫了慣常環境中工作、生活的忙碌與壓抑，重新給予了個體以生活指導從而實現身心狀況的改善。

訪談對象 C06 同樣提到“麗江慢悠悠的生活確實挺治癒的，在這裡，大家都經常坐一塊聊天，聊完心裡會敞亮很多，出去看看花、拍拍照、曬曬太陽，心裡就是很滋潤”。“慢”作為麗江古城變遷中塑造的獨特地方性和象徵環境，成為了麗江古城引導生活方式轉換，實現個體與地方積極情感交匯的關鍵因素。事實上“不消慌，才逍遙”是整個雲南地區潛移默化形成的時間觀念和生活理念，正是因為這種滲透在地方發展演化過程中的“慢”生活節奏，將旅遊者從快節奏社會裡暫時解脫，重新去體味生活的自由自在、愜意和本真，從而形成了個體與時間、生活、地方、自己之間的正向情感邂逅。正如 Deleuze 研究發現，地方上的情感邂逅將會轉移至身體層面，而使身體充滿喜悅，甚至改變著個體的情感取向和行動能力，也就意味著旅遊者內心所期待的“情感需要”在體驗過程能否得到滿足，也是在地方上的康復性體驗的重要體現。

4.3 社會體驗

社會支援歷來被視為促進健康和福祉、

緩衝各種風險和脆弱性的發生率和嚴重程度的重要維度，緊密的社會關係、頻繁的社會交往能夠促進個體的積極情感甚至是幸福感和滿意度提升。旅遊是一個社會交往的過程，對於旅遊目的地而言，各群體能夠在此空間範圍與更多的行為者建立更多樣化的關係，獲得社會支援、社會信任和人際互惠等，從而採取更多樣化的行動，便能夠產生相應的、正向的社會交往體驗。訪談對象 C02 來自浙江，他尤其強調了人際互動帶給自己的“療傷魔力”，他提到：“我是遺傳性白化病，一直以來極度自卑，前段時間我離婚了，整個人的思想和心理都陷入到偏激、極端的狀態。幸虧來了這，這裡的生活很美好，大家都很溫暖，沒有人對我的白化病問東問西，大家在一起就是討論有什麼地方好吃的、有哪可以一起去玩，晚上一起去慢搖吧，心態就改變了，那些極端的想法也就滅了，所以麗江古城是有療傷魔力，雖然我說不清楚到底是什麼改變了我，可能就是人際際遇吧。”

訪談對象 C40 是位單身媽媽，離婚之後自己獨立承擔著父母養老和孩子撫育，她認為自己能夠在麗江古城從離婚的悲傷情緒走出來，關鍵便是從麗江古城的社會交往過程得到充分訴說自身經歷的機會，而在日常生活中她的壓抑和痛苦往往無人傾訴，“我在麗江遇到的都是貴人。客棧老闆娘看我一整天都在房間不出去，吃飯就點外賣，她就一直叫我出來和他們一起聊天、喝茶、吃飯。剛開始我還不願意，後來實在耐不住人家熱情，就出來跟她聊。我和他們是陌生人，我可以毫無顧忌什麼都說，沒法跟家人、朋友說的，都跟他們說了，說完心裡敞

亮多了、釋懷了、心打開了。也聽了很多人的經歷，覺得自己這點坎坷也不算什麼。說實話，如果他們沒有主動找我聊天，我可能也不會覺得這個地方有治癒的神奇力量。”在 C40 看來，多樣化的人際關係、多元化的社會行動、簡單質樸的社會氛圍，甚至是交際、移情、傾聽和互動的技能，為個體的安全感、包容感、私密感和歸屬感提供了社會資源與社交支持，並且延伸成為旅遊者自我認同乃至社會認同的關鍵，達成了旅遊者“多重疾病”和“整體健康”的綜合療愈與提升。

C25 經歷辭職回到家鄉、逃離家鄉來到麗江停留，她表示自己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羞於開口求人、社交技巧匱乏、社交恐懼、不懂得如何跟外部世界相處，在現實和非現實、在迷失與自我追尋中徘徊。C25 提到：“其實我覺得麗江古城帶給我的治癒，主要還是跟這邊的人有關係，如果在這裡沒有遇到正確的人，就沒有遇到對的麗江古城。我在這裡交到了很好的朋友，一群人在一起開心地玩，也就不再社恐了。”C25 將社會交往與康復性體驗的結果進行了直接關聯，同時表明社會交往的複雜性會造成康復性體驗的不確定性。

5 結論與討論

5.1 結論

本文通過 2017-2020 年持續 4 年的案例地追蹤調查，從麗江古城的環境特徵和旅遊者的感知體驗，系統探究康復性體驗的形成過程，研究發現康復性體驗是旅遊者與目的地環境、日常生活環境之間互動呈現的動態過程與結果，具體獲得以下結論：

(1) 在麗江古城,自然、社會、象徵環境構成的康復性環境,與旅遊者日常生活環境形成反差性、互補性,為旅遊者康復性體驗提供了客觀基礎和外部條件。麗江古城自然環境賦予的舒適度與改造過程的宜居化是康復性景觀的原始化、理想化、客觀化存在;其社會環境塑造的包容、自由從情感關懷層面催化了康復性景觀的內涵延展;象徵環境隱含的浪漫、休閒與慢活從健康生活層面匹配了康復性景觀的要義,共同推動了環境與健康交互的新介面,呈現了地方生存發展的具體情境,為康復性體驗提供外部支援和客觀基礎。

(2) 物質體驗、情感體驗、社會體驗是旅遊者與麗江古城康復性環境的聯結方式,也是麗江古城康復性體驗的具體體現、形成過程與結果呈現。麗江古城自然、社會、象徵環境同構互促過程,為反差性、互補性生活體驗提供了資源構成與客觀基礎,旅遊者置身其中通過具體的、微觀的物質、情感、社會體驗,與麗江古城的環境和自身的日常生活產生有意、無意地聯結,從而實現了康復性環境與旅遊者個體性的聯通,康復性體驗的意義與價值也隨著“麗江古城—旅遊者體驗—日常生活”的動態交互不斷明晰和顯化。

5.2 討論

新冠病毒持續對人類健康產生影響,如何通過旅遊促進健康福祉仍需進一步探索,麗江古城康復性體驗的實證探究,試圖將旅遊的康復機制清晰化。研究發現,康復性體驗不僅是旅遊者生理、心理和社會上的健康感知,也是一種地理現象,闡釋了健

康與環境是最基本的人地關係。一方面,“環境本底”和“環境結構”是旅遊者獲得康復性體驗的基礎。旅遊目的地通過認識自然、適應自然、利用自然,創造了美麗宜居、自然生態、人地和諧的地理環境系統,提供了地方促進健康的生態輪廓,彰顯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本質,這既成為地方康復性景觀的實質性存在,也是賦予旅遊者康復性體驗的客觀基礎。旅遊目的地的環境特徵,也詮釋了現代醫療保健系統往往無法提供身體和精神康復的治療環境,反倒是大自然中蘊含的新鮮空氣、清潔水域、壯麗風景,建築環境暗含的壓力隔離、人文關懷、公平能夠激發個體闡釋康復性體驗的潛在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健康想像”與“健康體驗認同”確立和深化了康復性體驗的意義和內涵。日常生活中生存困境和意義模糊,激發了旅遊者對健康的迫切需求,成為了旅遊者在異時空環境中獲得放鬆、釋放自我、自我療愈體驗的關鍵驅動。旅遊者在“旅遊目的地與客源地”“逃離與融入”的流動過程中,重新建立了與自然的親密互動、按照個體價值觀和興趣偏好行事、獲得了他人的人際關懷與支持、獲得與日常生活暫時“解脫”、實現“去遠”和“詩意地棲居”,促使旅遊者在逃離和尋找生活意義中達成共識。康復性體驗的意義也從表面的放鬆感官體驗,關聯到更深層次的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情感健康及整體健康的調整和康復。旅遊情境中康復性體驗形成機制實際上是“旅遊目的地環境—旅遊者主觀體驗—康復性意義”三元關係的互動與關聯(見圖3)。

康復性體驗映射出結構主義與人文主義地理學中的“人-地關係”判斷,一方面,

康復性景觀是由地方內部自然環境、社會環境、象徵環境交織共同體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和諧關係網絡的獨特性所決定，回應了結構主義對地方整個格局、區位和自然條件的強調；另一方面，處於地方之上的外部群體的想像與實踐、經歷與體驗、主體意識、價值認同深化了康復性景觀的內涵，強化了康復性景觀的獨特性、差異性和作用機制詮釋，回應人文主義對主體情感認

同和主體意識的強調。康復性體驗實際上闡釋地方與健康、自然與社會、人文與生態之間的辯證關係，地方的無序開發與環境犧牲，終究會使康復性景觀消失殆盡。康復性體驗追根究底是人類對生存品質、生命意義的主動追尋，旅遊目的地高品質發展過程需要主動對接社會大眾對健康的需要，而不是停留在物化景觀的感官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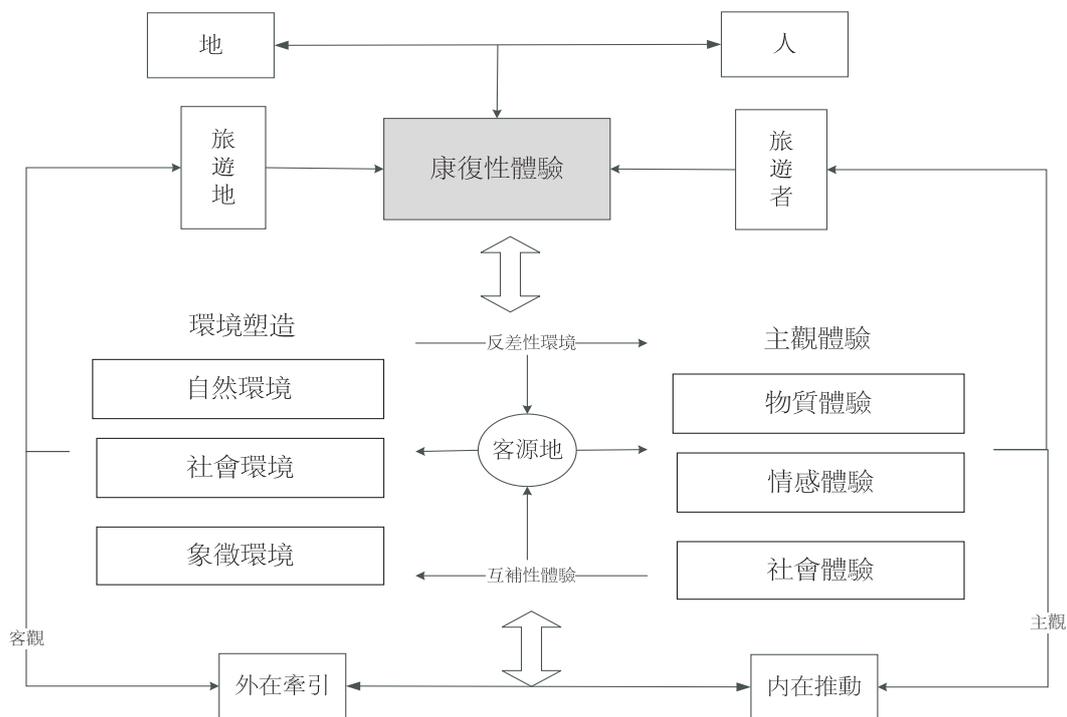


圖3 旅遊者康復性體驗的形成機制

參考文獻

- [1] Athinson, S. K. (2015). Stable and destabilised stat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Dance and movement as catalysts of transition.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16(1): 75-94.
- [2] Andrews, G. J. (2020). Health geographies III: More-than-representational pushes and expression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4(5): 991-1003.
- [3] Alaazi, D. A., Masuda, J. R., & Evan, J., et al. (2015). Therapeutic landscapes of home: Exploring indigenous peoples' experiences of a housing first intervention in Winnipeg.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47: 30-37.
- [4] Benson, M., & O'Reilly, K. (2016). From lifestyle migration to lifestyle in migration: Categories, concepts and ways of thinking. *Migration Studies*, 4(1): 20-37.
- [5] Baum, F. (2016). *The new public heal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 Bell, S. L., Foley, R., & Houghton, F., et al. (2015). From therapeutic landscapes to healthy spaces, places and practices: A scoping review.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47: 30-37.

- science & medicine, 196: 123-130.
- [7] Carter, A., Greene, S., & Nicholson, V., et al. (2016). 'It's a very isolating world': The journey to HIV care for women living with HIV in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3(7): 941-954.
- [8] Carpiano, R. M. (2006). Toward a neighborhood resource-based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for health: Can Bourdieu and sociology help?.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2(1): 165-175.
- [9] Clark, T. N. (2004). *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 New York: Elsevier, 103-140.
- [10] Duff, C. (2011). Networks, resources and agencies: On the character and production of enabling places. *Health & Place*, 17(1): 149-156.
- [11] Doughty, K. (2013). Walking together: The embodied and mobile production of a therapeutic landscape. *Health & Place*, 24: 140-146.
- [12] Deleuze, G. (1988). *Spinoza: Practical philosophy*.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49-50.
- [13] English, J., Wilson, K., & Keller-Olaman, S. (2008). Health, healing and recovery: Therapeutic landscapes and the everyday lives of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7(1): 68-78.
- [14] Finlay, J., Franke, T., & McKay, H., et al. (2015). Therapeutic landscapes and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Impacts of blue and green spaces for older adults. *Health & Place*, 34: 97-106.
- [15] Foley, R. (2011). Performing health in place: The holy well as a therapeutic assemblage. *Health & Place*, 17(2): 470-479.
- [16] Gorman, R. (2017). Therapeutic landscapes and non-human animals: The roles and contested positions of animals within care farming assemblages.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18(3): 315-335.
- [17] Ghosh, T., & Mandal, S. (2019). Medical tourism experience: Conceptualization,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58(8): 1288-1301.
- [18] Gesler, W. M. (1996). *Lourdes: Healing in a place of pilgrimage*. *Health & Place*, 2(2): 95-105.
- [19] Gustafson, P. (2002). Tourism and seasonal retirement migratio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9(4): 899-918.
- [20] Kearns, R., & Milligan, C. (2020). Placing therapeutic landscape a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health & place. *Health & Place*, 61: 102224.
- [21] Kaspar, H., Walton-Roberts, M., & Bochaton, A. (2019). Therapeutic mobilities. *Mobilities*, 14(1): 1-19.
- [22] Liamputtong, P., & Suwankhong, D. (2015). Therapeutic landscapes and living with breast cancer: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Thai wome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28: 263-271.
- [23] Leung, J. P. (1998). Emotions and mental health in Chinese people.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7(2): 115.
- [24] Mannell, R. C., & Iso-Ahola, S. E. (1987). Psychological nature of leisure and tourism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4(3): 314-331.
- [25] Nash, D., & Smith, V. L. (1991). Anthropology and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8(1): 12-25.
- [26] Neely, A. H. (2015). Internal ecologies and the limits of local biologies: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uberculosis in the time of AID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5(4): 791-805.
- [27] Otto, J. E., & Ritchie, J. B. (1996). The service experience in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17(3): 165-174.
- [28] Plane, J., & Klodawsky, F. (2013). Neighbourhood amenities and health: Exami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a local park.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99: 1-8.
- [29] Palinkas, L. A., & Wong, M. (2020).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mental health.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32: 12-16.
- [30] Parkins, W., & Craig, G. (2006). *Slow Living*. New York: Berg, 15-18.

- [31] Smith, K., Luginaah, I., Lockridge, A. (2010). Contaminated ' therapeutic landscape: The case of the aamjiwnaang first nation in ontario, Canada. *Geography Research Forum*, 30: 83-102.
- [32] Su, X. (2010). The imagination of plac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A case study of Lijiang Ancient Town, China. *Tourism Geographies*, 12(3): 412-434.
- [33] Tengland, P. A. (2006). The goals of health work: quality of life, health and welfare. *Medicine, Health Care and Philosophy*, 9(2): 155-167.
- [34] Tselepidaki, I. G, Asimakopoulos, D. N., & Katsouyanni, K., et al. (1995). The use of a complex thermohygro-metric index in predicting adverse health effects in Athe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meteorology*, 38(4): 194-198.
- [35] Tikkanen, I. (2007). Maslow's hierarchy and food tourism in Finland: Five cases. *British Food Journal*, 109(9): 721-734.
- [36] Tawil, O., Verster, A., & O' Reilly, K. R. (1995). Enabling approaches for HIV/AIDS prevention: Can we modify the environment and minimize the risk?. *Aids*, 12: 1299-1306.
- [37] Urry, J. (2007). *Mobili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8.
- [38] Wang, K., Cui, Q., & Xu, H. G. (2018). Desert as therapeutic spac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embodied experience in sand therapy in Xinjiang, China. *Health & Place*, 53: 173-181.
- [39] Wilson, K. (2003). Therapeutic landscapes and first nations peoples: An exploration of culture, health and place. *Health & Place*, 9(2): 83-93.
- [40] Zhang, Q., Zhang, H., & Xu, H. (2021). Health tourism destinations as therapeutic landscapes: Understanding the health perceptions of senior seasonal migrant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79: 113951.
- [41] 包曉光. 小資情調. 長春: 吉林攝影出版社, 2002: 6-11.
- [42] Cresswell T. 地方: 記憶、想像與認同. 徐苔玲, 王志弘, 譯. 臺北市: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006: 60-132.
- [43] 丁雨蓮, 陸林, 黃亮. 文化休閒旅遊符號的思考——以麗江大研古城和徽州古村落為例. *旅遊學刊*, 2006, 21(7): 12-16.
- [44] 大蕃茄傳媒機構. 麗江的柔軟時光(最新珍藏版).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7: 1-69.
- [45] 段義孚. 逃避主義. 周尚意, 張春梅, 譯.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 3-5.
- [46] 顧彼得. 被遺忘的王國: 麗江 1941-1949. 李茂春, 譯.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2: 52-321.
- [47] 郭文. 浪漫主義地理學: 探索人性與大地互動中崇高卓越的景觀. *地理研究*, 2021, 40(11): 3242-3252.
- [48] 高宣揚. 當代社會力量.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5: 849.
- [49] 黃力遠, 徐紅罡. 巴馬養生旅遊——基於康復性景觀理論視角. *思想戰線*, 2018, 44(4): 146-155.
- [50] 李黎. 旅遊品牌形象的要素及其傳播——以雲南旅遊為例. *新聞界*, 2011(2): 130-131.
- [51] 李大偉, 李誠固, 馬佐澎, 等. 旅遊影響下的地方音樂及其對地方的建構——以麗江古城為例. *地理科學進展*, 2018, 37(6): 833-843.
- [52] 呂宛青, 汪熠傑, 倪向麗. 從歷史文化名城到浪漫邂逅之都的變遷——基於網路文本分析的麗江大研古城旅遊迷思演變研究. *旅遊研究*, 2020, 12(6): 14-28.
- [53] 龔勝生, 王無為, 楊林生, 等. 地理學參與健康中國建設的重點領域與行動建議. *地理學報*, 2022, 77(8): 1851-1872.
- [54] 梁晨晨, 李仁傑. 綜合 LDA 與特徵維度的麗江古城意象感知分析. *地理科學進展*, 2020, 39(4): 614-626.
- [55] 馬勇, 趙蕾, 宋鴻, 等. 中國鄉村旅遊發展路徑及模式——以成都鄉村旅遊發展模式為例. *經濟地理*, 2007(2): 336-339..
- [56] 毛剛. 生態視野·西南高海拔山區聚落與建築. 南京: 東南大學出版社, 2003: 73.
- [57] 馬天, 謝彥君. 旅遊體驗的社會建構: 一個系統論的分析. *旅遊學刊*, 2015, 30(8): 96-106.

- [58] 彭丹, 黃燕婷. 麗江古城旅遊地意象研究: 基於網路文本的內容分析. 旅遊學刊, 2019, 34(9): 80-89.
- [59] 彭富春. 海德格爾與現代西方哲學.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9(5): 56-62.
- [60] 錢俊希, 楊瑾, 朱竑. 現代性語境下地方性與身份認同的建構——以拉薩“藏漂”群體為例. 地理學報, 2015, 70(8): 1281-1295.
- [61] 世界文化遺產麗江古城保護管理局, 昆明本土建築設計研究所. 麗江古城傳統民居保護維修手冊. 昆明: 雲南科技出版社, 2006: 3.
- [62] 孫九霞. 旅遊商業化與納西族民居的“去地方化”——以麗江新華社區為例. 社會科學家, 2015(11): 7-13.
- [63] 孫九霞, 王學基. 旅遊目的地居民本土休閒文化與地方實踐——以雲南麗江為例. 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 41(3): 65-72.
- [64] 孫九霞, 羅婧瑤. 旅遊發展與後地方共同體的構建. 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3): 101-108.
- [65] 宋幕新. 去麗江療傷. 長春: 時代文藝出版社, 2011: 1-155.
- [66] 陶偉, 田銀生, 吳霞. 世界遺產中古城研究方法與內容初探. 地理研究, 2002(2): 210-218.
- [67] 譚見安. 健康、環境、發展——當代醫學地理的主題. 地理學報, 1994, 49(S1): 710-718.
- [68] 王睿. 玉龍山下有桃源——淺析麗江大研古城的空間意匠. 東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5(S1): 286-290.
- [69] 王寧. 旅遊、現代性與“好惡交織”——旅遊社會學的理論探索. 社會學研究, 1999(6): 93-102.
- [70] 徐紅罡, 王珂. 康復性流動視角下的健康與養生旅遊研究展望. 旅遊導刊, 2018, 2(6): 1-16.
- [71] 謝彥君. 旅遊體驗研究: 一種現象學的視角.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5.
- [72] 謝彥君. 旅遊體驗的情境模型: 旅遊場. 財經問題研究, 2005(12): 64-69.
- [73] 肖篤甯, 李秀珍. 當代景觀生態學的進展和展望. 地理科學, 1997, 17(4): 356-363.
- [74] 約瑟夫·洛克. 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 劉宗嶽, 譯. 昆明: 雲南美術出版社, 1999.
- [75] 余海波, 余嘉華. 木氏土司與麗江.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2: 28-76.
- [76] 於立平, 曹荊. 麗江歷史. 中國地名, 2007(2): 47-59.
- [77] 餘慧. 汶川地震災區歷史文化名城災後價值分析與保護研究.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學, 2012: 40-42.
- [78] 楊慧, 凌文鋒, 段平. “駐客”: “旅遊者”“東道主”之間的類仲介人群——麗江大研、東河、大理沙溪旅遊人類學考察. 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2, 34(5): 44-50.
- [79] 楊婕, 陶印華, 劉志林, 等. 鄰里效應視角下社區交往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基於北京市26個社區居民的多層次路徑分析. 人文地理, 2021, 36(2): 27-34.
- [80] 楊振之. 再論旅遊的本質. 旅遊學刊, 2022, 37(4): 140-152.
- [81] 尹凱. 消費遺產: 想像、情感與浪漫主義——評《中國的遺產與浪漫消費》. 民族藝術, 2019(6): 71-75.
- [82] 周尚意, 楊鴻雁, 孔翔. 地方性形成機制的結構主義與人文主義分析——以798和M50兩個藝術區在城市地方性塑造中的作用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9): 1566-1576.
- [83] 朱良文, 王賀. 麗江古城環境風貌保護整治手冊. 昆明: 雲南科技出版社, 2009: 1.
- [84] 張曙光. 人的存在的歷史性及其現代境遇(上)——對馬克思關於人的存在思想的重新解讀. 學術研究, 2005(1): 28-39.
- [85] 鄭紅娥. 國民健康: 中國當今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 社會, 2003(3): 4-7.
- [86] 趙紅梅. 世界文化遺產——麗江古城浪漫意象的生產與消費. 百色學院學報, 2014, 27(6): 63-69.